

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调整及其政策评估^{*}

张一飞

内容提要:战略定位是主权国家在权力博弈中对他与本国间地位、角色关系的认知。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欧洲的同盟定位出现了“附庸—伙伴”的摇摆区间。历史与现实证明,美国对欧战略定位及其调整主要取决于美国削弱和控制欧洲的可行性,具体受到美国相对于欧洲的硬实力优势、俄罗斯向西塑造地缘政治环境的力度、欧洲团结与分裂的性质以及中国的发展等因素影响。在俄乌冲突导致俄欧关系高度恶化的情况下,美国倾向于将欧洲定位为受控附庸,并可能在下一阶段制定和实施巩固优势、弱俄控欧、强化北约、联欧制华等政策。从这些政策的长期效果来看,美国霸权基础或将受损,欧洲大国提升战略自主的倾向或将加强,俄中两国将继续保持不结盟的战略定力,全球发展与合作可能放缓乃至倒退。

关键词: 战略定位 附庸 伙伴 俄乌冲突 美欧关系

自古希腊以降,整部西方国际关系史本质上是一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斗争史。这种对抗张力不仅存在于敌国之间,也存在于盟国之间。相较于前者,后者更为隐蔽,亦更能体现西方国际关系的本质。

近世超级大国的出现标志着控制者能力达到巅峰,反控制者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弱势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战略高层普遍倾向于把当时正在走向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欧洲国家定位为美国的核心同盟。^① 这一基础定位跨越冷战进入 21 世纪,仍然总体保持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欧洲的同盟定位并非一个“实心原子”,

* 感谢《欧洲研究》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承担。

^① 参见王道、夏亚峰:《跨大西洋视野下的双层博弈——迪安·艾奇逊与美欧联盟之构建》,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53-157页。

而是一个浮动空间。在条件成熟时,美国倾向于与欧洲建立主从关系,使欧洲在内外政策上服从美国指令,服务美国利益;在条件不足时,美国则倾向于与欧洲建立平等关系,允许欧洲在与美国存在利益分歧的情况下仍然拥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力和自我利益空间。^①一言以蔽之,美国对欧洲的同盟定位出现了由“受控附庸”与“平等伙伴”组成的摇摆区间。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哪些因素影响美国对欧战略定位及其调整?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对欧战略定位将会如何调整?这一调整将导致美国哪些政策走向?其政策效果如何?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一 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研究现状与历史演变

(一) 战略定位的概念界定

国际关系学界至今未对战略定位形成相对统一的概念界定,与之相关的成果主要散见于对三个问题的研究中。

一是对国际格局的研究,主要关乎发起战略定位的环境限定。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提出,在无政府环境中,功能相似性的国家是只存在实力差异的同质行为体。^②这便为战略定位的主体规定了单元特征与互动起点。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揭示了国际结构更为阴暗的一面,即国家之间无法真正了解彼此的真实意图。^③因此,国家对彼此的战略定位基本上只有“敌人”一种选择,至少无法彻底放下防备。这一观点间接指出战略定位被国际环境赋予了一种隐秘且稳定的消极性。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则从国家对威胁和联盟的认知角度阐释了对他国进行战略定位的动机。^④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思路——即使在霍布斯的世界中,国家也可以在“利尽而散”之前交到“朋友”。

二是对身份关系的研究,主要关乎发起战略定位的主观依据。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身份发生于利益之前。^⑤这种关系决定论含蓄地宣告了身份定位即是战略定位。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并认为“不同”与“和”无法

^① 参见 Bruce Stokes, “Setting the Table: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US-EU Relations,” European Parliament, November 2022,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IDAN/2022/739278/EPRS_IDA\(2022\)739278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IDAN/2022/739278/EPRS_IDA(2022)739278_EN.pdf)。

^②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129页。

^③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4页。

^④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1页。

^⑤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70-171.

兼容。^① 这为隶属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的战略定位蒙上了主观对立的阴影。

三是对战略决策的研究,主要关乎战略主体对战略对象的认知。一些学者试图探索“决策去人格化”的可行性,其中包括间接消除战略定位主观性的尝试。詹姆斯·托马森(James S. Thomason)和詹姆斯·贝斯菲尔德(James N. Bexfield)提出,可以用“完整风险评估与管理模型”辅助经验丰富的决策者,以求最大程度实现分析的客观性。^② 张楠也认为,可以依靠面向公共衍生大数据分析 with 政府决策过程重构的新学科,研究知识如何影响和评估政府决策。^③ 但更多学者则倾向于直接观察决策者或者决策集团的素质和认知,这便将发起战略定位的主体再次拉回到“人”。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试图在决策者的认知错觉与消极决策的结果之间建立因果假设,并以大量历史经验对其加以验证。^④ 其研究正是在“决策思维决定政策效果”这一大前提下进行,并指出了诸多普遍、稳定存在的认知错觉。乔纳森·伦肖(Jonathan Renshon)和斯坦利·伦肖(Stanley Renshon)进一步发掘了决策者主观因素与决策流程、利益交换等客观条件的互动关系。^⑤ 这些研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战略主体发起准确战略定位具有一定难度,以及战略定位本身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尽管上述研究没有直接论及“战略定位”,但是却为定义战略定位提供了诸多启发。首先,既云“定位”,则定位内容势必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其次,既云“战略”,则定位的依据应是是否有助于实现本国以权力界定的利益,不宜被过度抽象至身份、文明等理念层面的异同。突破历史唯心主义的遮蔽可知,身份、文明及其制度衍生品的本质是实践的产物,是国家在历史中形成的最优生存策略,并非先验存在,亦不可能永恒不变。^⑥ 国家间身份或文明的认同不足以彻底对冲利益格局的矛盾。根据利益形成的定位势必随利益变化而处于动态调整之中。最后,利益应被权力界定,被“定”之“位”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地位,而权力的主体间性又势必涉及身份角色。据此,可将战

^①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336页。

^② James S. Thomason and James N. Bexfield, “Improving Strategic Decision and Senior Level Teamwork in US Nat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s,”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 (Annual Report), 2017, p.4.

^③ 张楠:《公共衍生大数据分析 with 政府决策过程重构:理论演进与研究展望》,载《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0期,第21页。

^④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428页。

^⑤ Jonathan Renshon and Stanley Rensh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9, No.4, 2010, pp.512-533.

^⑥ [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0页。

略定位定义为主权国家在权力博弈中对与他国与本国间地位、角色关系的认知,其内涵是主观认知,其外延是两国关系。识别一国对另一国战略定位的着眼点应是能够反映该国对两国地位、角色关系认知的言论与行为,而非实现落实这一关系的政策手段和最终效果——战略定位不等于这一定位在现实政治中的落地情况。

(二)关于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研究现状

目前政策界与学术界对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观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

一是美国对跨大西洋合作机制的主动塑造。《北约战略概念 2022》明确指出,“欧洲联盟是北约独特且核心的合作伙伴”,美欧共同的任务是“威慑与防御”“危机预防与管理”“安全合作”。^①这说明美国在政治上或可给予欧盟一定的独立身份,但在军事上却不会对欧洲国家“松绑”。兰德公司在对欧洲防务自主的研究中发现,美国为欧洲军事独立设下了“不可抛开北约另搞一套”的红线。如果欧盟要加强防务,便不得不提高对北约的贡献,而北约却由美国主导,因此,欧盟在美国的约束下极难实现防务自主。^②赵怀普、韩宝禄日认为,尽管北约成员国的根本安全利益一致,但是其中既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存在“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两种要素共同构成美国塑造北约规则的动力。^③邢悦、刘钊、常欣则从政策面指出,特朗普政府急于逼迫欧洲分担美国在北约的责任,导致美国对欧洲的关系性权力下降,但俄乌冲突却为美国加强对北约和欧洲的机制化领导力提供了契机。^④

二是美国对美欧互动过程的理解。托马斯·怀特(Thomas Wright)认为,美国对欧洲的实用主义立场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已暴露无遗。欧洲已进入“后美国”时代,必须既争取美国回归与欧洲的深度绑定,又不断强化战略自主能力,准备应对“美国永远离去”的最坏结果。^⑤王道、夏亚峰从跨大西洋关系的历史源起考察了影响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国际与国家双层互动,并回顾了美国国内围绕“是否为欧洲提供安全保护”与“是否支持欧洲一体化”所展开的历史辩论。^⑥赵晨系统总结了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对欧政策工具从“蛮权力”到“巧权力”的演变,间接归纳了美

^①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at the NATO Summit in Madrid,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9, 2022, p.10.

^② RAND Europe,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in Defense,” Rand Corporation, 2021, pp.37-38.

^③ 赵怀普、韩宝禄日:《美欧防务责任分担矛盾的缘起、发展及影响》,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第119页。

^④ 邢悦、刘钊、常欣:《关系性权力与美国领导地位的兴衰》,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4期,第72-86页。

^⑤ Thomas Wright, “A Post-American Europe and the Future of U.S. Strategy,” Brookings, December 2017, <https://www.bosch-stiftung.de/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pdf/2018-05/Post%20American%20Europe.pdf>.

^⑥ 王道、夏亚峰:《跨大西洋视野下的双层博弈——迪安·艾奇逊与美欧联盟之构建》,第153-157页。

国对欧战略定位的调整规律。^①

三是美国在具体议题中对欧洲的要求。在气候变化、伊朗拥核、海外军事行动、经济制裁协作、货币合作、贸易规则、自贸协定、全球基建、“中国威胁”等问题中,美国均对欧洲服从本国利益抱有积极预期。但是,欧洲独特的利益诉求与美国的战略目标时分时合,这也不断反作用于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定位,使后者不断围绕“是否合作”“是否平等”“是否必要”“是否可行”等问题左右摇摆、上下起伏。^②

尽管上述战略文件与研究成果没有直接讨论美国对欧战略定位,但却为学者从政策变化反向透视相关定位的演变提供了丰富材料,也为进一步探索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演变规律及其衍生政策奠定了深厚基础。

(三) 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历史演变与调整区间

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演变可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国建国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定位是“政治隔绝的远方”。美国主要关注国内问题和拉丁美洲,对欧洲保持高度孤立主义倾向,几乎没有参与欧洲自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任何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③第二阶段是一战后至二战前,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定位是“地位相当的对手”。虽然威尔逊总统改造欧洲旧大陆的自由主义计划破产,但是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得到了欧洲国家对其实力地位的认可。与此同时,欧洲主要大国与美国又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对立——英国与法国在战后秩序的安排中

^① 参见赵晨:《特朗普的“蛮权力”外交与美欧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赵晨:《从“蛮权力”回归“巧权力”:拜登政府对欧政策初评》,载《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3期。

^② 参见 Jacques Pelkmans et al., “EU- US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2014,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etudes/join/2014/528798/IPOL- JOIN- ET%282014%29528798_EN.pdf; “The Politicization of Transatlantic Trade in Europe: Explaining Inconsistent Preferences Regarding Free Trade and TTIP,” Joint Research Cente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https://joint-research-centre.ec.europa.eu/system/files/2020-05/jrc117871.pdf>; Lorenzo Cotula, “Europe’s Controversial TTIP Treaty: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nnecessary,” IIED, July 10, 2014, <https://www.iied.org/europes-controversial-ttip-treaty-good-bad-un-necessary?gad=1&gclid=EAIaIqobChMlp96qrteUgAMVIP5MAh2IdgWHEAMYAiAAEgKJDvD-BwE>; 董一凡、孙成昊:《美欧气候变化政策差异与合作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4期;金良祥:《大变局视角下美欧在伊朗问题上的合分分及启示》,载《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2期;魏冰:《美国北约盟友在海外军事行动中的行为选择》,载《欧洲研究》,2021年第3期;刘建伟:《美欧经济制裁协作的特点、限度及其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5期;胡弘志、左海聪:《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中欧货币合作:动因及前景》,载《国际贸易》,2020年第7期;David Dorn and Peter Levell, “Trade and Inequality in Europe and the US,” IZA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December 2021, <https://ifs.org.uk/publications/trade-and-inequality-europe-and-us>; “EU-China 2030: European Expert Consultation on Future Relations with China,” European Parliament, December 2022,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22/739240/EPRS_STU\(2022\)739240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22/739240/EPRS_STU(2022)739240_EN.pdf); Nuran Talu, “European Union Climate Policy,” European Union and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9, https://www.iklimi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modul_03_en-1.pdf; 孙彦红:《欧盟通过“全球门户”计划加入全球基建潮》,载《世界知识》,2022年第3期;宋锋、王笑天:《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欧洲角色》,载《国际观察》,2022年第3期。

^③ 参见刘德彬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3-75页。

排挤美国;法西斯化的意大利、纳粹化的德国与美国存在意识形态分歧;苏联更是西方的公敌。在大萧条前后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甚至因疲于应对欧洲对手而再次陷入孤立主义情绪。^① 第三阶段是二战之后,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定位是“地位较低的同盟”。自罗斯福政府后期开始,美国便已决定以塑造有利于本国的外部环境来维护国家安全,亟须欧洲作为其地缘政治前线、投资消费市场与意识形态伙伴;欧洲也需要美国的经济扶持和军事保护。尽管双方需求吻合并结为同盟,但这种关系起初并不平等,先是一种保护与被保护、援助与被援助的关系,后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美国从本国安全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将欧洲视为受美国控制的附庸,以“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组织为抓手,从经济和军事这两个基础领域基本掐住了欧洲战略自主的“命门”,并极力促使欧洲对美国在经济和安全上的依附关系投射至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等领域。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欧洲的军事控制和经济剥削并无实质性改变,但在某些时期出现了给予欧洲更平等战略地位的政策倾向。一是因为苏联解体使欧洲东部压力骤减,美国失去了介入、控制欧洲的主要借口和稳定抓手;二是因为欧盟范围不断扩大,欧洲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国家赢得了摆脱控制、独立行动的能力;三是因为美国综合国力周期性浮动,有时对欧洲的控制力有不逮。^② 然而,在有条件加强对欧控制时,美国仍会倾向于将美欧关系扳回冷战期间的“正轨”,因此,美国对欧战略定位出现了区间化特征。在同盟关系的约束下,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本质是美国将欧洲视为地位更低的附庸还是地位平等的伙伴。

二 影响美国对欧战略定位及其调整的主要因素

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形成与调整主要围绕其控制和剥削欧洲的可行性而非必要性展开,因为必要性不言自明,可行性却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用资本主义精神概括了资产阶级最深层次的行为内驱动力,他们将财富而非幸福作为一切行动的目的,并最大程度追求提高财富的增值效率。^③ 美国是受资本主

^① 参见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257页。

^② 尽管美国在与西欧盟国的龃龉中没有像苏联对待东欧盟国那般强势粗暴,但美国总会使用灵活方式在欧洲努力维持“让美国进来,让俄国出去,让德国下去”的局面,亦即实现由美国一方控制欧洲。上述三点是美国对欧战略定位出现一定摇摆空间的原因,而非左右美国如何摇摆的变量。

^③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2-57页。

义精神支配的霸权国家,它既像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拥有无限扩张资本的原始冲动,又拥有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所缺少的超强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影响力。因此,无论战略对象是中国、俄罗斯还是欧洲,使用强制力和吸引力增强控制力,并以此追求资本无限增值是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恒定倾向。^①不可否认,受限于某些时期的客观条件,美国也会将欧洲定位为平等伙伴,并就此出台政策,甚至会在个别时期呈现出一种远离欧洲、重归孤立主义的假象。然而,即使在真正奉行孤立主义的时期,美国把欧洲定位为“远方”也只是在介入能力不足时的无奈之举,在可以实施控制、服务资本增值的拉美地区,美国在实力初兴之际便已提出“门罗主义”。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将欧洲定位为受控附庸的内在冲动稳定存在,可谓只要“可行”,永远“必要”。

需要强调的是,增强对外控制力和资本增值之间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张力,前者要求投资,后者谋求回报。但在两者没有出现手段异化目的的情况下,手段的强化与目的的实现正向相关,“增强”和“增值”都可以也应该是美国对欧战略定位下的政策目标。这决定了美国控制欧洲的理想效果是使欧洲处于“有限强大”和“有限自主”状态——过于“强大”和“自主”的欧洲将削弱美国优势,不利于美国“增强”;而过于“弱小”和“依附”的欧洲则可能需要美国过度消耗并成为战略负担,不利于美国“增值”。因此,将欧洲定位为附庸,绝不意味着美国希望将欧洲置于严重混乱和衰落的状态;定位为伙伴,亦不意味着美国会平视欧洲或屈己从人。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逻辑起点是欧洲在遏制苏联的战略中处于地理前沿,美欧关系在非安全领域对两国的重要性均附着于两者的地缘政治关系之上。^②因此,考察影响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因素时,应主要着眼于美国自身实力及其对外战略中的主要地缘政治力量。

(一) 美国相对于欧洲的硬实力优势

物质决定意识,格局影响定位,考察美国对任何国家战略定位的逻辑起点应是其硬实力相对优势的存在与变化。不可否认,与冷战时期相比,欧洲在软实力层面形成了较强的观念影响力与规则塑造力,这同样作用于欧美关系,并对美国对欧定位及其衍生政策构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但是,从战略思想史的演变阶段来看,二战后,美国明显出现了将道德、制度、法律工具化的思想倾向,这与其在一战后按照理想主义、自由

^① 军事精英追求物质优势无限扩大,政治精英追求意识形态正义性无限提升,两者共同服务于企业富豪的资本无限增值。参见[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王崑、许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参见王道、夏亚峰:《跨大西洋视野下的双层博弈——迪安·艾奇逊与美欧联盟之构建》,第153-156页。

主义思路改造世界的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① 美国学者提出“软实力”概念并被战略界广泛接受,这一现象本就说明美国将价值理念、规则制度视为手段而非目的。^② 美国的价值观变化既使其对非美式价值理念的影响形成较强的心理防御能力,又使欧洲在试图以软实力弥补硬实力差距时频频遭遇美式实用主义鸿沟。因此,硬实力优势对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影响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硬实力主要由军事和经济实力组成。由于美国军事实力遥遥领先于欧洲,欧洲国家与美国军费开支、军备存量的差距波动很难对美国产生心理影响,因此,本文主要考察美国经济实力优势与其对欧战略定位的关系。

美国相对于欧洲的经济优势越大,便越有能力最大限度撬动欧洲服务美国利益,也更倾向于将欧洲定位为附庸;反之,则为伙伴。一是美国可以充分发挥经济优势形成诸多政策杠杆,干预和引导欧洲国家在贸易、金融、科技、基建等领域的对外关系,半强制性地促使欧洲对外政策服从美国对外战略;^③二是美国可以凭借巨大经济优势证明自身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并以此吸引欧洲国家的社会力量认可美式意识形态,对冲欧洲的反美主义思潮;三是美国可以通过保持对欧洲的投资能力以及营造国内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欧洲资本,促使欧洲出于利益捆绑更加倾向于服从美国资本意志,并由此使美国获利;^④四是美国可以利用充裕的经济力量收买和拉拢其他盟友、伙伴国家作为欧洲的“替代品”,降低欧盟战略地位和欧洲中小国家的安全感,并以此威胁欧盟整体或某些国家积极配合美国战略。

(二) 俄罗斯向西塑造地缘政治环境的力度

苏联解体后,北约和欧盟持续东扩。“俄罗斯坚持认为,1990年两德统一时美国曾向苏联承诺,北约不会东扩。美国和北约则坚称,对于北约停止东扩没有任何正式承诺或书面协议。”^⑤同时,欧洲相对平坦的地形地貌决定了“边境之战即是决战”,欧洲国家希望将俄罗斯的行动能力限制在尽可能遥远的地方,以维护自身安全。因此,北约和欧盟的东扩在西方看来主要是战略防御,但对俄罗斯而言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

^① 参见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第38-257页。

^②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20 Anniversary, No.80, 1990, pp.153-171.

^③ Daniel Kliman et al., “Forging and Alliance Innovation Base,” CNAS, March 29, 2020,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forging-an-alliance-innovation-base>; Martijn Rasser, “The Case for an Alliance of Techno-Democracies,” CNAS, October 19, 2021,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the-case-for-an-alliance-of-techno-democracies>; 姜胤安:《“全球门户”前景不明》,《半月谈》,2022年5月9日, http://www.banyuetan.org/gj/detail/20220509/1000200033136201652063476634470773_1.html。

^④ 《拜登的补贴发出“危险信号”,欧洲产业流向美国》,Financial Times 中文网,2022年11月20日, <http://www.ftchinese.com/interactive/90498?full=y&exclusive>。

^⑤ 韩克敌:《北约东扩与乌克兰危机》,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5期,第36页。

战略进攻。东欧国家不断加入北约和欧盟不仅有悖于苏联时期斯大林在欧洲方向的进攻型战略构想,^①也不符合俄罗斯保持对欧缓冲地带的防御型战略构想。美国与欧洲的政治军事控制范围越东进,俄罗斯越感到需要以逆向对冲获得一个稳定的西部安全边界。欧洲把俄罗斯视为最严重的安全威胁,因此,俄罗斯也成为美国用来牵制欧洲的最直接、最便利的外部因素。

俄罗斯向西对冲西方东进的力度越大,美国越有便利条件深度控制欧洲,进而越倾向于将欧洲定位为附庸;反之,则为伙伴。一是面对俄罗斯的“西进”,中东欧国家需要美国牵头西方共同遏制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保护自身乃至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安全,从而使美国作为“受邀方”在军事上进一步深入控制欧洲拥有西方内部的合法性;二是传统安全问题天然重要且紧急,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将使北约组织与美国安全政策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权重上升,欧盟不得不向受美国主导的北约让步;三是若欧洲整体与俄罗斯陷入伤耗局面,则美国外交地位自然提升,更有条件以离岸平衡手的姿态向欧洲提出更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要求;四是美国评估俄罗斯暂时不会对欧洲形成实质性的致命威胁,美国有充分的时间在欧洲部署操控力量。“美国国防部自1992年至1997年对俄罗斯重新对欧亚大陆构成威胁的时间表进行了测算,结果是时间越来越长,从2年左右延长到10到15年。”^②即使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也并不认为俄罗斯有可能攻入欧洲腹地。2023年2月20日,拜登总统甚至亲自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③这间接证明,美国安保部门认为俄乌冲突在短时间内不会蔓延至乌克兰东部以外的更多地区。

(三) 欧洲内部团结和分裂的性质

欧洲情况复杂多变,从欧洲内部出发分析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定位,必须分领域、分情境考察欧洲所处的不同状态。当欧洲处于议题性团结或进程性分裂时,美国往往倾向于将欧洲定位为附庸;反之,若处于议题性分裂或进程性团结时,则为伙伴。

所谓“议题性团结”,即欧洲在安全等关键领域意见高度一致或在某种紧急状态下利益高度一致。在前一种情况下,欧洲有可能谋求突破附庸角色或在伙伴角色下寻求实现过多与美国利益相悖的权力诉求,如此美国或将不再拘泥于可行性角度考虑对欧战略定位调整,而是从必要性角度出发,采取多种方式对冲欧洲战略自主走强的趋

^① 参见[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敌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页。

^② [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③ “In Photos: Biden Visits Ukraine and Poland,” CNN, February 22,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2/20/world/gallery/biden-visit-ukraine-poland/index.html>.

势,力图将其置于对美国较为安全的附庸地位。在后一种情况下,欧洲对欧美同盟关系的依赖度自然上升,美国将有更多抓手乘虚而入,使欧洲附庸化的可行性大幅上升。

所谓“进程性分裂”,即欧洲一体化进程发生实质性停滞或逆转。欧洲的战略自主与一体化进程整体呈正相关关系,“战略自主”概念出自1994年《法国防务白皮书》,其核心含义是不能只依靠北约的保障以致陷入对北约的依赖。2013年,“战略自主”概念主要用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指狭义的领土安全和欧盟防务方面的“战略自主”。此后,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外部冲击使欧洲在防务、能源、供应链和数字化等领域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发展全方位“战略自主”显得更加迫切,因此,欧盟将该概念的外延推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政策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实现防务自主、能源自主和经济自主被列为优先事项。^① 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将严重削弱欧洲战略自主能力,各国将无法团结一致反对美国不利于欧洲的军事、经济政策。同时,欧洲各国分歧反而有可能被美国利用,成为美国“有打有拉”的政治抓手——美国可以利用欧洲内部的亲美国家制衡孤立反美疏美国家,先与部分欧洲国家政策协调,后向其他国家施压。

所谓“议题性分裂”,即欧洲在某些非安全领域的利益出现严重分歧,政策倾向高度冲突。在此情况下,虽然美国可能掌握更多战略干预的机会,但是一旦卷入欧洲事务,有可能被迫承担较高的外交成本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舆论压力。相较于将欧洲从伙伴变为附庸的长期收益而言,美国的短期损失可能过大。因此,美国将倾向于暂时与欧洲国家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压力超载。

所谓“进程性团结”,即在没有外部压力且不反对北约军事垄断地位的情况下,欧洲一体化高速发展,并成为欧洲政治的主流。在此情况下,美国缺少从整体或局部深度控制欧洲的政治抓手,强行施控可能适得其反。同时,若欧洲并不追求突破同盟的基础定位,美欧关系尚有可能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受美国主导。

(四) 中国的发展

与客观存在的美欧实力差距和俄罗斯外部压力不同,中国的高速发展为欧洲提供了机遇而非造成“威胁”。正常情况下,中国发展越成功,欧洲越能从中受益且战略“退路”越多,越不利于美国控制欧洲。但是,俄乌冲突从两个方面为美国提供了在“中国发展”与“欧洲受益”之间建立负向联系的机会。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正在将

^① 傅聪:《欧洲“战略自主”前景几何?》,《半月谈》,2023年5月17日, http://m.banyuetan.org/gj/detail/20230517/1000200033136201684313824482043321_1.html。

传统的“欧洲防俄、亚太遏中”的区域地缘战略重塑为“美欧遏制中俄”的全球地缘战略。如此,在地区层面几无矛盾的欧洲与中国便被纳入欧亚大陆“边缘”与“中心”的对立格局。在集体情感方面,美国更是试图引导欧洲国家将其对俄罗斯的憎恨、恐惧“移情”至中国。美国智库、媒体广泛讨论了所谓“中俄联盟”对西方的“威胁”,不惜造谣中俄已签订所谓“秘密防务协议”。^① 2023年4月,在中国坚持对俄乌冲突劝和促谈的情况下,美国仍主导北约外长会议重点讨论所谓的“中俄结盟问题”,^②阻挠中欧关系缓和与发展的意图十分明显。如此,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被塑造为“远东俄罗斯”,与欧洲出现身份对立。

在美国制造的中欧对立的逻辑与氛围下,中国越是发展强大,美国就越有条件制造议题煽动欧洲恐惧、引导欧洲行为,进而越倾向于将欧洲定位为附庸。^③ 一是中国与欧洲意识形态差异客观存在,美国以“保护”欧洲免受“威权主义”侵害之名,在动员欧洲惧华、反华上存在客观便利,也有利于在意识形态层面掌握领导欧洲的主动权;二是欧洲国家重视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规则,美国以保护国际秩序之名,拉拢欧洲共同防止中国“修正”国际规则,符合某些欧洲国家的意愿,也有利于美国在关键领域中增加对欧洲的规则话语权;三是某些欧洲国家在经贸金融、科技人文等领域与中国客观上存在竞争关系,在中国优势更加凸显之际,美国将中欧市场之争夸大为安全之争、政治之争,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四是即使某些欧洲国家坚持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美国也可通过与欧洲的特殊关系在中欧合作发展中以“搭便车”的方式间接获益,分流、削减欧洲在中欧合作中的红利。

(五)关于影响因素的综合说明

第一,上述四个因素按照其重要性降序排列,依次为美国实力的相对优势、俄罗斯的“西进”力度、欧洲的实际状态和中国的发展。没有自身实力优势,美国便无法抓住三者为其提供的使欧洲成为附庸的机会;俄罗斯因素与欧洲内部因素的重要性在理论上持平,但是前者为美国控制欧洲提供的可行性支持更加直接,因此排序更前;中国

^① Min Ye, “The Logic behind China and Russia’s Strategic Alliance-like Partnership,”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ril 14, 2022, <https://gia.georgetown.edu/2022/04/14/the-logic-behind-china-and-russias-strategic-alliance-like-partnership/#:~:text=Following%20the%20China%20and%20Russia%20Joint%20Statement%20on,Russia%20needs%20China's%20investment%2C%20goods%2C%20and%20its%20market;Ted%20Snider,“Did%20Russia%20and%20China%20Sign%20a%20Secret%20Defense%20Pact?”%20Responsible%20Statecraft,December%2013,%202022,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2022/12/13/have-russia-and-china-signed-a-secret-defense-agreement/>.

^② “NATO Foreign Ministers Wrap up Meetings with Focus on China and Support to Ukraine,” NATO, April 5,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213454.htm?selectedLocale=en.

^③ 但是,如果中国实力急剧衰退、发展严重受挫,欧洲将不再有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外交筹码,也很难被美国视为平等伙伴。

在地缘政治上距离欧洲过远,且在许多领域与欧洲尚有较强的相互依赖关系,与其他三个因素比较,对美欧关系影响力相对较弱。若各变量对美国的影响作用相互对冲,应考虑其重要性排序造成的影响程度差异。

第二,上述因素对美国对欧战略定位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直接性影响。中东、中亚、东北亚等地缘政治区域对美欧关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个别领域,且每个区域另有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较少被美国决策层和战略界与对欧定位合并考量。

第三,上述分析并未过多考虑意识形态相似性作用下美国的“亲欧”心理。美欧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和强大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战略定位”不同于“文明定位”或“观念定位”,战略须以权力界定的利益为认知依据。理念因素对美国对欧战略定位有一定的影响,但仅限于加速或延缓美国的利益认知。从战略定位的形成规律来看,不应将战略定位的主观性起点与物质性取向相混淆,或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与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混淆。

第四,上述分析并未过多考虑美国排斥欧洲“搭便车”的心理。因为美国设计的地区集体安全机制天然是一种“搭便车”机制,除非放弃北约的军事垄断地位,否则被欧洲“搭便车”即为必然。特朗普拒绝欧洲“搭便车”的本质是对欧施压范围的非理性扩大化,是将欧洲在短时间内强行改造为附庸的努力,虽然操之过急,却并非真正切割跨大西洋关系的尝试。问题的关键不是欧洲是否存在“搭便车”行为,而是美国是否认为欧洲“搭便车”的结果有利于加强对欧控制,并使其成为服务美国利益的工具。

第五,上述因素仅能较大程度影响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定位,却无法决定美国能否最终落实相应的地位、角色关系。换言之,影响认知的要素未必能够左右认知内容在现实复杂系统中的执行结果。

三 相关因素与作用规律的现实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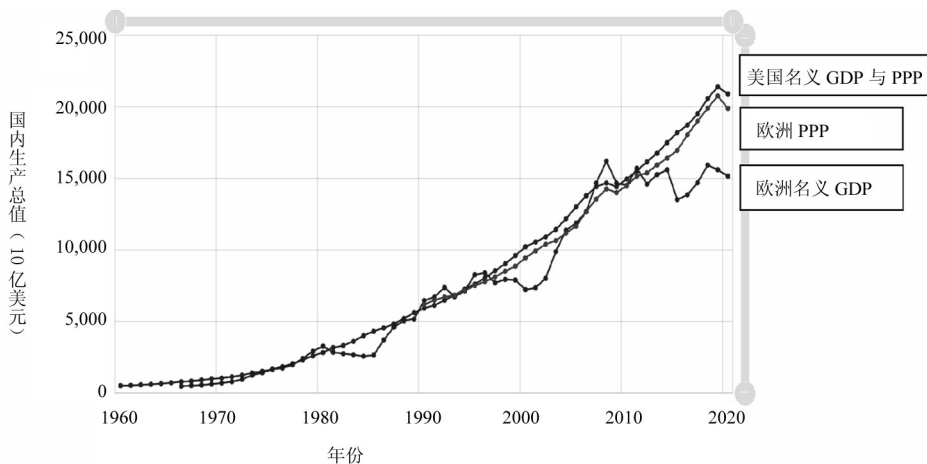
由于定位是主观产物,无法直接观察,要判断美国对欧洲是何战略定位,应重点考察能够反映美国对美欧间地位、角色关系认知的言论和行为,而不应被强硬或温和的政策风格所蒙蔽——强硬背后可能是无能为力的愤怒,温和背后可能是强势掌控的从容。本文认为,关于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衡量标准如下:在美欧同盟关系仍然存在的前提下,如果出现美国要求欧洲牺牲自身利益服务美方利益的言行,则可直接证明美国在该阶段视欧洲为受控的附庸。如果美国仅要求欧洲与美国保持战略协同,无须损己利美,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视欧洲为附庸的可能性,但至少说明美国对过度向欧洲索

取的可行性或时机心存疑虑,或美欧双方在这一阶段的某些问题上利益高度一致,伙伴亦能实现附庸功能。如果美国出现明确支持欧洲战略自主的言论与行为,则可直接证明美国在该阶段视欧洲为伙伴。

(一) 美国相对于欧洲的硬实力优势

“由于结构性权力定义在宏观层次上,其分布特征和动态变化可以较为直接地映射出国际格局,既可以把握格局整体式样和走势,又能够对体系中的特定位置和特定区域进行针对性分析。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由广泛、密集、贯通的二元交换关系构成的全球性网络,这为研究结构性权力提供了微观基础和宏观结构。”^①在美欧军事差距波动几可忽略的情况下,^②对美国相对优势的考察应主要集中于经济实力所代表的硬实力。从经济优势的输入端来看,美国既拥有金融、经贸杠杆优势,又拥有相关话语权优势,但从输出端来看,经济优势与最终形成控制力之间仍然需要经济总量这一中间变量发挥作用。

图 1 1960 年至 2020 年美欧国内生产总值变化



资料来源: <https://statisticstimes.com/economy/united-states-vs-eu-economy.php>。

从冷战后美欧各自名义国内生产总值(Nominal GDP)的对比来看,美国相对于欧

^① 庞珣、何晴晴:《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9 期,第 30 页。

^②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Passes \$2 Trillion for First Time,” SIPRI, April 22, 2022, <https://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22/world-military-expenditure-passes-2-trillion-first-time>.

洲实力优势较大的时期包括小布什政府中前期、奥巴马政府中后期,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时期。^①这四个时期正是美国对欧战略统筹力度最大的时期,虽然四届政府对欧政策不同,但均可反映出美国对欧洲的附庸定位。

小布什政府中前期,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为本国利益极大损害了欧洲利益,美欧关系跌至二战后的“冰点”。一是欧洲国家在北约组织中的地位降低。尽管某些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参与了伊拉克战争,但是它们在决定是否发起和如何开展战争的过程中几乎没有话语权。^②二是追随美国的欧洲国家几乎没有获得实际利益。派兵参战的英国、波兰、丹麦、荷兰与提供外交后勤支持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均未在战中和战后从美国支配的伊拉克处“分一杯羹”。^③英国布莱尔政府甚至因失去民意支持而于2007年下台。三是美国出兵造成欧洲严重对立。围绕是否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欧洲分裂成以英国为首的亲美派与以法、德为首的反美派,当时的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勋爵甚至认为“2003年是北约的分水岭。我们即将在伊拉克问题上倒闭”。^④

奥巴马政府中后期,美国再次出现损欧利美的战略倾向。奥巴马政府前期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与气变问题上着力修复美欧关系,但随着美国逐渐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恢复对欧洲的经济实力优势,奥巴马政府开始要求欧洲为美国利益做出牺牲。一是在TTIP谈判中,要求欧洲在监管、处罚和投资补偿标准上向美国利益妥协。美国司法部甚至于2014年6月对触犯美国而非欧盟法律的法国巴黎银行处罚89.7亿美元。^⑤二是向欧洲转嫁国际安全成本。美国开始要求欧洲的北约盟友改变其在安全问题上“搭便车”的局面,并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⑥

特朗普政府时期是美欧关系的“灾难期”,美国对欧政策清晰反映了前者对后者的附庸定位。一是强硬要求乃至威胁欧洲国家分担北约防务成本。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北约成员国防长会议上表示,如果北约其他盟友无法增加军费开支,美国将适度地“微调”其对北约的承诺,并称“美国纳税人不会为了捍卫西方价值观而毫无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并预测,美欧名义GDP在2021年分别为226753亿美元和170464亿美元,2022年分别为240037亿美元和180225亿美元,2023年分别为248926亿美元和188393亿美元,2024年分别为257901亿美元和195783亿美元,差距整体呈扩大趋势, <https://statisticstimes.com/economy/united-states-vs-eu-economy.php>。

^② “NATO and the 2003 Campaign against Iraq,” NATO, May 19, 2022,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51977.htm。

^③ 钟连发:《伊拉克战争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载《当代世界》,2003年第6期,第16页。

^④ “Press Conference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Lord Robertson,” NATO, December 1, 200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0327.htm?selectedLocale=en。

^⑤ 赵晨:《奥巴马政府对欧政策调整》,爱思想,2018年8月10日, <https://m.aisixiang.com/data/111511.html>。

^⑥ 同上。

节制地承担开支”。^① 二是不顾欧洲反对,加征高额关税。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3月1日宣布对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欧盟立即做出强烈反应,考虑对大约35亿美元美国产品征收25%的高额关税,特朗普政府随即威胁对欧盟汽车征税。^② 三是明确“降格”北约地位。特朗普总统在不同场合多次质疑北约存在的意义。^③ 这与冷战期间美国以退出北约要挟欧洲更多投入对苏防御如出一辙。^④

尽管拜登政府改变了前任政府对欧洲的强硬态度,但对欧洲的附庸定位在其对欧政策中仍然可见一斑。一是联合欧洲制裁俄罗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拉拢欧洲对俄罗斯进行全面经济制裁,导致欧洲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天然气供应危机,经济滞胀风险进一步加剧,^⑤美国能源企业却从欧洲进口转向中大获其利。二是向欧洲转移美国经济危机。2022年8月,拜登总统签署《通胀削减法案》,支持为主要生产环节在美国境内完成的绿色产业提供高额补贴,以缓解国内通胀、削减财政赤字。欧洲国家普遍指责该法案包含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损害欧洲工业,为美国企业争取竞争优势。^⑥ 三是以意识形态裹挟欧洲参与美国对华战略。美国在各领域领导北约服务其对华战略并推动北约参与亚太事务,这无疑给众多欧洲国家背上了新的战略负担,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欧互信。

(二)俄罗斯向西塑造地缘环境的力度

冷战后,俄罗斯两次力度较大的“西进”均刺激美国寻求以更大力度统筹美欧关系。两次危机中,美国均因控制欧洲的可行性上升而将欧洲定位为附庸,并借俄罗斯因素争取在美欧利益博弈中的有利态势。

第一次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奥巴马政府试图借机从根本上恶化俄欧关系。在2014年9月24日的联合国讲话中,奥巴马总统称俄罗斯是与“埃博拉病毒”和“伊

^① 《美国施压盟友 要求分担军费》,《中国日报》,2017年2月21日, https://world.chinadaily.com.cn/2017-02/21/content_28280179.htm。

^② 《新闻分析:贸易战阴影笼罩美欧关系》,新华网,2018年3月8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3/08/c_1122507087.htm。

^③ 《特朗普去年曾多次表示希望退出北约》,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19年1月15日, <https://cn.wsj.com/articles/-11547529631>。

^④ John M. Schuessler and Joshua R. Shiffrin, “The Shadow of Exit from NATO,”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13, No.3, 2019, pp.38-42.

^⑤ 《欧洲各界人士和媒体报道指出——对俄制裁严重损害欧洲经济》,人民网,2022年5月24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524/c1002-32428451.html>。

^⑥ 《欧盟要反制美〈通胀削减法案〉》,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12月17日,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22-12/17/content_25954850.htm。

斯兰国”并列的世界“三大威胁之一”。^①同时,美国政府还不断升级对俄罗斯能源、军火、银行业的经济制裁,极大伤害了欧洲现实利益,以致欧盟决定单方面采取较为缓和的对俄制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明确表示:“必须恰当地对待俄罗斯,我们不能让华盛顿决定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②这说明美国试图以本国利益左右欧洲外交的努力被欧洲察觉和反对。美国与欧洲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的分歧逐渐公开化,^③本质上反映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烈度提升。

第二次是2022年俄乌冲突。美国试图趁机恶化欧洲的地缘政治环境,固化美欧在安全上的不平等关系,并以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与军民生命为代价满足美国军工复合体利益。美国以履行北约职责为借口,大大强化了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欧洲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交互“加注”的安全困境。拜登总统在2022年马德里北约峰会上明确宣布,美国将加强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在波兰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军事总部,即美国“第五军团”,向英国增派两个F-35战斗机中队,并将向德国和意大利增派更多“防空和其他力量”。^④更有甚者,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价格一度高达美国本土天然气市场价的四倍。^⑤美国还和欧盟签署了一项协议,2030年之前,每年向欧洲运送500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比美国目前的出口能力高出近50%。^⑥

(三) 欧洲团结与分裂的性质

冷战结束后的十余年里,欧洲整体处于进程性团结状态,欧洲一体化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且并不追求“防务独立”和“战略自主”。在此情况下,美国允许欧洲拥有一定的独立战略意志和自由发展空间。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发表美国对欧洲政策声明中甚至指出,他和他的政府“支持欧盟及其发展更加强大的共同机构,美国不仅鼓励欧洲搞经货联盟,它原则上也赞同欧盟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

^① 韩克敌:《特朗普的对俄政策与美俄关系的四个维度》,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4期,第57页。

^②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称欧洲必须改善与俄罗斯关系》,路透中文网,2015年10月9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eu-junker-russia-idCNL3S1291LJ20151009>。

^③ 《奥巴马将俄国能源公司纳入制裁范围》,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7月17日, <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40717/c17sanctions/>。

^④ 《拜登刚刚宣布:美国将加强在欧洲军事部署》,《北京日报》,2022年6月29日, <https://bj.bjd.com.cn/5b165687a010550e5ddc0e6a/contentShare/5b16573ae4b02a9fe2d558f9/AP62bc301ce4b01c9fa7b22604.html>。

^⑤ “US Selling Gas to European Countries at High Price,” MEHR News, October 17, 2022, <https://en.mehrnews.com/news/192542/US-selling-its-gas-to-European-countries-at-high-price>。

^⑥ “US Natural Gas Prices Surge as Europe Turns away from Russian Energy,” *Financial Times*, May 5,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eb251839-d556-472c-8bbf-243dc9aaf09a>。

政策”。^①

对于欧洲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环境危机背景下的“议题性分裂”状态,美国基本采取不闻不问态度和放任自流政策。这些危机爆发的根源均与美国相关,但美国不仅没有“下场相助”,反而继续将其国内治理和对外战略的副产品转移到欧洲。^②

对英国脱欧造成的“进程性分裂”状态,美国高调支持并采用多种手段巩固欧洲分裂的实质性“成果”。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后,美国一方面强烈支持英国彻底退出欧盟,^③另一方面明显丰富了“五眼联盟”的综合性功能,并成立奥库斯(AUKUS)同盟,加强英国在其他受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中的作用。在分化欧洲、巩固对英控制的态度上,拜登与特朗普政府如出一辙。

对欧洲争取战略和防务自主以及在俄乌冲突中表现出的“议题性团结”状态,美国分别采取了破坏压制和介入利用等措施,试图将欧洲置于服从美国的附庸地位。在欧洲谋求防务自主的议题上,美国始终强调北约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基石性作用,并在欧盟试图独立发展对外防务时屡屡加以破坏。^④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破坏行为未必以强硬姿态完成,也可能谋求先融入后主导。比如,克林顿政府在政治方面表示尊重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但在军事方面,“为缓解欧盟要求发展自身防务的压力”,“提议在北约内建立一支‘诸兵种联合特遣部队’(CJTFs),以使西欧联盟的部队能在美军不参加的情况下独立采取行动,执行使命过程中可使用北约的设施。不过,‘诸兵种联合特遣部队’的行动必须获得北约理事会的批准,这实际意味着美国对此类行动拥有否决权”。^⑤此外,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利用两次乌克兰危机控制、削弱欧洲等行为上文已述,此处不做赘论。

(四)中国的发展

为团结欧洲共同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一边阻挠中欧合作,防止欧洲对美国离心离德或借助中国力量加强战略自主;一边把欧洲视为遏制中国的工具,推动欧洲分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压力。在中国平稳健康发展且中欧关系相对稳定

^① 赵怀普:《战后美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论析》,载《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第16页。

^② 参见《专家:欧债危机根源在美次贷危机已开始全球化》,中国新闻网,2011年11月3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11/11-03/3434719.shtml>;李翠亭:《欧洲难民危机与美国民主输出的悖论》,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30页。

^③ 《博尔顿称美国强烈支持英国脱欧,即使未达成协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9年8月13日,<https://cn.wsj.com/articles/-11565652607>。

^④ 《欧盟防务自主困难重重 美国想方设法阻止》,新华网,2021年9月8日,http://www.news.cn//mil/2021-09/08/c_1211361273.htm。

^⑤ 赵怀普:《从“特殊关系”走向“正常关系”——战后美欧关系纵论》,载《国际论坛》,2006年第2期,第46页。

的背景下,美国谋求牺牲欧洲从中国发展中受益的机会,让欧洲辅助美国对华战略遏制,体现了美国对欧洲的附庸定位。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利用欧洲的战略焦虑,迅速把本国对华战略目标融入北约组织目标。2022年6月,北约马德里峰会公布《北约战略概念2022》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位为西方利益、安全和价值的“威胁”与“挑战”。^①2022年11月,在北约布加勒斯特外长会议上,美国及其欧洲盟友重点讨论了所谓“中国野心勃勃的军事发展、技术进步以及日甚一日的网络能力”,并将此视为“长期挑战”。^②这些表述与2017年以来美国发表的多份重要战略文件如出一辙。可见,欧洲已在战略层面被美国利用,并在意识形态、网络、科技、舆论等领域与其绑定加深。这也说明炒作“中国威胁”已经成为美国提升控制欧洲可行性的的重要手段。

(五)关于现实观察的综合说明

第一,当诸多因素的作用结果正向叠加时,无法严格区分哪种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比如,冷战后十余年的时间里,美国将欧洲定位为平等伙伴,原因既包括美国经济优势不足,也包括欧洲处于进程性团结状态。

第二,当诸多变量的作用逆向叠加时,美国对欧洲的附庸定位往往覆盖伙伴定位,并在政策中有所体现。将欧洲附庸化的倾向是美国对欧战略定位中的常数,因此,只要存在一定的可行性,美国便会付诸实践。比如,2014年至2016年,欧洲因内部危机和俄罗斯“西进”同时造成欧洲的议程性分裂和议程性团结。美国对欧洲难题不闻不问的同时,整体更倾向于利用克里米亚危机加紧对欧渗透和控制。

第三,中国因素对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影响持续时间尚短,需要进一步观察。如果未来中国发展程度突破一定阈值,中欧经济合作达到无法“脱钩断链”的程度,美国资本力量有可能在可行性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放弃对中欧合作的破坏,转而采取“搭便车”政策,并允许欧洲获得一定的战略自主性。

四 附庸定位下美国对欧政策取向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欧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美国利用印太经济框架恢复经济,^③

^①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NATO, June 9–10, 2022, <https://www.nato.int/strategic-concept/>.

^② “NATO Foreign Ministers End Meetings in Bucharest with Focus on China, More Support for Partners,” NATO, November 30, 2022,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209493.htm?selectedLocale=en.

^③ 《有关印太经济繁荣框架的声明》,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2022年5月24日,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statement-on-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欧洲却面临多项经济指标恶化的困境,美国优势稳步扩大;①俄罗斯“西进”力度达到冷战后最强;欧洲随之进入持续反俄和间歇性争取战略自主的议程性团结;中国逐渐摆脱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极影响,稳步回归经济发展正轨。因此,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在联盟框架下对欧洲进行地位降级的可行性条件较为充分,或将一方面继续创造和巩固绝对控制欧洲的可行性条件,另一方面在不过分削弱欧洲的前提下,迫使欧洲为美国利益牺牲自身利益。

(一)投资本国、巩固优势

一是维持高额军费开支,确保美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2023财年,美国国防预算高达8579亿美元,参议院在通过授权法案时明确表示,要加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并继续执行欧洲威慑倡议。②目前,美国正在考虑继续增加2024财年的国防预算,预计超过8860亿美元,且欧洲投资方向仍是重点。美国国防部表示,2024财年的预算不会朝新的方向发展。③相较之下,欧洲各国军费总和在2021年刚刚达到2570亿美元,④在俄乌冲突背景下,2022年,中欧和西欧国家的军费总和也不过3450亿美元,其中,不属于欧盟的英国就达到685亿美元。⑤

二是增加科技投资,在中长期激发美国的经济发展潜力。美国要继续塑造控制欧洲的可行性条件,便须利用科技创新优势从根本上长期稳定地保持经济发展活力。拜登政府已明确提出“投资创新以保持未来竞争力”,具体而言,美国将长期投资清洁能源、电子制造业与生物科技的科学研究。⑥从此前特朗普政府的科学技术、基础设施政策来看,即使2024年以后共和党政府上台,相关政策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尽管增加投资并非完全针对欧洲,但其金融和贸易效果将在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扩大对欧经济优势。

三是加紧重塑先进制造业能力,寻回美国产业链优势。在未来的制造业发展和产

① 《多重经济冲击令欧洲成俄乌冲突主要经济受损者》,新华网,2022年4月24日,http://www.news.cn/world/2022-04/24/c_1128590821.htm。

② “Summary of the Fiscal Year 2023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December 2022, 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fy23_ndaa_agreement_summary.pdf。

③ Marcus Weisgerber, “The Pentagon’s 2024 Budget Proposal, in Short,” *Defense One*, March 13, 2023, https://www.defenseone.com/policy/2023/03/heres-everything-we-know-about-pentagons-2024-budget-proposal/383892/。

④ “Military Expenditure (current USD)—European Union,” The World Bank, 2022,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XPND.CD?locations=EU。

⑤ 陈荣生:《2022军费:美国领跑全球,欧洲增幅最大》,《青年参考》,2023年5月12日,第7版。

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业链规划中,以“团结意识形态相似国家”的名义提振美国自身优势是关键一环。尤其是在芯片制造业,美国一方面吸引全球芯片设备、原材料、制造厂家进驻本国,加强相关产业链独立性,振兴美国就业市场;^①另一方面以本国企业为依托,整合和掌控欧洲芯片制造业,比如,英特尔公司计划投资 800 亿欧元在欧洲各国部署研发设计、封装生产全产业链。^②这些在美和对欧投资周期漫长,不以美国执政党更迭而转移。

(二) 弱俄掠欧、坐收渔利

一是继续阻挠俄乌和谈。早在 2022 年 2 月 28 日到 3 月 29 日期间,俄乌双方已进行五轮谈判,但美国屡次在俄乌谈判取得一定进展时,追加、升级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装备,并反对乌克兰接受俄罗斯提出的最低要求。^③2023 年 2 月,中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同年 3 月,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即表示,美国反对在乌克兰立即停火,并认为此举不会促进持久和平的实现。^④阻挠俄乌和谈的本质是阻止俄欧缓和关系。鉴于美国军工复合体目前仍能从俄乌冲突中获益,美国的“反和阻谈”政策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即使战场对抗在未来某一时刻中止,经此冲突,俄欧关系也很难迅速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美国仍有机会利用甚至制造新的俄欧矛盾。尽管有共和党政客表示:“如果入主白宫,将不会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但是美国资本利益高于领导人政策偏好,且该政客同时也表示“希望欧洲提供更多资金”。^⑤即使未来因执政党更迭,美国可能出现共和党式的对欧政策转变,但对欧定位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二是继续怂恿欧洲国家援乌制俄,在削弱俄罗斯的同时,降低欧洲战略自主性。欧洲对乌克兰援助越多,与美国对俄政策绑定也越深,并被迫承受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俄罗斯固然有可能在能源、粮食、贸易、网络空间、国际舆论方面受到消极影响,^⑥但欧盟也不得不在降低对俄依赖的同时,提升对美的依赖。在欧洲对外政策受

^① “The CHIPS Act Has Already Sparked \$200 Billion in Private Investments for U.S. Semiconductor Productio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December 14, 2022, <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the-chips-act-has-already-sparked-200-billion-in-private-investments-for-u-s-semiconductor-production/>.

^② “Intel Announces Initial Investment of Over €33 Billion for R&D and Manufacturing in EU,” Intel Newsroom, March 15, 2022,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newsroom/news/eu-news-2022-release.html#gs.roxfij>.

^③ 《俄乌和谈陷入停滞 美国难辞其咎》,新华社,2022 年 6 月 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2-06/09/c_1211655066.htm.

^④ 《美国驳斥中国提出的乌克兰冲突立即停火主张》,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3 年 3 月 17 日, <https://sputniknews.cn//20230317/1048796707.html>。

^⑤ Jack Forrest, “Trump Won’t Commit to Backing Ukraine in War with Russia,” CNN, May 11,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5/10/politics/ukraine-russia-putin-trump-town-hall/index.html>.

^⑥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March 24,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24/joint-statement-by-president-biden-and-president-von-der-leyen/>.

美国制约达到一定程度时,美国未来甚或变“呼吁”为“敦促”乃至“威胁”,迫使欧洲进一步与俄罗斯走向两败俱伤。

三是继续从多个方面窃取欧洲优质发展成果。除了强化现行对欧政策强度,在美国国会日益走向政治极化的背景下,^①美国还有可能借机蛊惑某些欧洲国家分别与其签订长期不平等合作协议,并将现有对欧洲政策的有利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有欧洲学者认为,目前拜登政府对欧洲战略定位相对平等,担心在后拜登政府时代,美国对欧战略定位将有消极变化。^②这显然忽视了眼下三方面事实:第一,当下拜登政府对欧洲的所谓“伙伴”定位仅仅停留在文本和语言层面,欧洲没有从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定位中得到预期收益,反而负担更重;^③第二,如果美欧实力格局和外部条件没有改变,这一定位不会因美国国内政党政治而改变,改变的只可能是落实定位的政策,比如,民主党倾向于从联欧制俄中牟利,共和党则倾向于将乌克兰完全甩给欧洲,前者为美增收,后者为美减负,但“欧洲受损+美国获益”的定位设计完全一致;第三,最重要的是,美国国会已出现将当下欧洲的义务和损失法律化、机制化的倾向。^④一旦形成国内法规,无论美国未来对欧定位与政策如何变化,欧洲的被动地位将很难改变。

(三)强化北约、压制欧盟

一是持续扩大北约成员和北约亲密合作伙伴的范围,强化北约基本实体。继芬兰正式加入北约之后,^⑤瑞典已获得土耳其同意,可能很快加入北约;摩尔瓦多可能因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与俄罗斯发生冲突,^⑥通过美国向北约寻求军事保护;奥地利等国在欧盟内部更分裂、外部压力更强大之际,未来也有可能效仿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

二是持续加强北约整合西方内部事务的能力,逐渐蚕食欧盟功能。对欧洲国家而言,欧盟的政治、经济功能与北约的军事功能相对分明。若美国以北约为抓手,协同西方一致行动,这在事实上侵蚀了欧盟的对内自决权与对外独立权。2023年1月,欧盟

^① “Why Power in Congress is Now So Precarious?” CNN, June 20,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6/20/politics/congress-butterfly-effect-fault-lines/index.html>.

^② Judy Dempsey, “Europeans Must Prepare for the Post-Biden Era,” *Carnegie Europe*, November 8, 2022, <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europe/88348>.

^③ Gerret Martin and Ville Sinkkonen, “Past as Prologu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in the Biden Era,”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Special Issue, 2022, pp.117-120.

^④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European Union Responses and US-EU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15, 2023,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N/IN11897>.

^⑤ “Finland Joins NATO as 31st Ally,” NATO, April 4,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213448.htm.

^⑥ 《摩尔多瓦安全局局长:俄罗斯准备在2023年进攻摩尔多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2年12月20日, <https://sputniknews.cn/20221220/1046519651.html>.

与北约签订《欧盟—北约合作联合宣言》，进一步强调两个组织要在气候变化、基础设施等与传统安全无关的事务中紧密合作，并“鼓励非欧盟成员的北约盟国尽可能充分参与欧盟的各项举措，鼓励不属于北约的欧盟成员尽可能充分参与倡议”。^①这明显扩大了北约染指欧洲一般事务的范围和程度，混淆了两个组织的功能与定位。美国正在无形中推动北约覆盖欧盟事务，今后或将更甚。如果北约与欧盟的成员基本重合、主要功能基本雷同，则北约将因掌控欧盟所缺少的军事防务能力而在欧洲事务中权重更高。届时，无论欧洲在一体化进程与关键性议题层面处于团结还是分裂状态，美国均有能力“出场”“镇场”和“清场”。

三是持续增加北约存在感，降低欧洲国家对欧盟的价值和身份认同。“欧盟和北约传统上被认为具有相同的价值观，这既是最初西欧与美国建立军事联盟的前提，又是欧盟与北约履行‘联盟团结’义务的基础。这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跨大西洋关系被认为具有抵御危机的能力。但是，欧盟比北约更强调‘有效的多边主义’的规范性目标，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对世界和平、维护并发展国际法的核心责任。随着历史的演进，欧盟和北约之间逐渐出现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价值分歧。”^②如果某些欧盟国家谋求通过追随美国获取利益，而其他国家拒绝“小恩小惠”、坚定捍卫欧盟传统价值观，则欧盟可能出现政治分裂、身份认同下降等问题。

（四）拖欧下水、遏制中国

一是通过意识形态对立和泛安全化理念进一步塑造欧洲认知，拉拢欧洲共同封锁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空间。在科技方面，美国正在向欧洲持续灌输中国有可能将所谓“缺少透明度”的高科技用于反对西方民主意识形态。早在2021年6月，美欧便已设立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宣布加强双方在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清洁技术等领域的技术合作，以及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半导体信息透明等方面的标准联合。^③以此为基础，下一阶段，美国将以北约为抓手，长期拉拢欧洲“共同塑造新技术的道德和规范”。^④在经济方面，美国正在向欧洲施加影响，致力于重塑全球产业格局。美国将

^① “Joint Declaration on EU-NATO Cooperation,” NATO, January 10,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10549.htm.

^② 郑春荣、倪晓娜：《历史演进视角下的欧盟与北约关系走向——兼析拜登当选的影响》，载《国际展望》，2021年第2期，第51页。

^③ 《美欧通过TTC第三次会议加快构建技术合作“俱乐部”》，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2023年1月13日，<https://www.essra.org.cn/view-1000-4703.aspx>。

^④ NATO, “Speech by NATO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Mircea Geoiță at NATO’s First Annual Data and AI Leaders’ Conference,” November 8, 2022,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08823.htm?selectedLocale=en.

要求欧洲在稀土、手机、汽车、军事装备等产品上降低对华依赖,提高所谓“社会和基础设施的韧性”,以求“不给专制政权任何机会破坏我们的弱点”。^① 不应被忽视的是,中国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的后果表面上由欧美同担,但实际上,欧洲比美国损失更大。中美关系已跌至两国建交以来最低谷,诸多领域的合作红利在短时间内相对有限,而中欧关系较中美关系发展更好,双方协调转圜余地更大,因此,追随美国的欧洲国家不仅承受了协助美国封锁中国的代价,还付出了与中国合作所获收益等机会成本。

二是加紧推动亚太国家与北约合作,接受北约参与亚太事务。2022年6月,日本和韩国领导人首次以“亚太伙伴”的身份参加了北约马德里峰会。与会各方宣称,北约将和亚太合作伙伴开启扩大合作的路线图,以确保更密切的政治磋商和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上的联手合作。^② 2022年5月,韩国国家情报院被北约卓越合作网络防御中心接纳;^③同年11月,日本也宣布正式加入该中心。2023年1月,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分别访问韩国和日本。^④ 4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均派员参加了北约布鲁塞尔外长会议,讨论所谓“中俄反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问题。^⑤ 可见美国正在尝试继续推动大西洋、太平洋两大同盟体系“融会贯通”,并将因中国持续发展壮大而在未来加大行动力度。

三是以北约为平台拉拢某些欧洲国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近年来,美国联合欧洲国家加大了在中国周边军事行动的频率与强度。仅2022年,美国先于6月底至8月初主导了“环太平洋-2022”联合军演,拉拢英、法、德三国参与反舰、反潜、反水雷、两栖登陆、海上机动、防空反导等课目演练,针对中国意味明显;^⑥随后又于8月中旬至9月初邀请英、法、德三国参与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举办的“漆黑-2022”联合军演,为美国打造“亚洲版北约”提供支持。^⑦ 俄乌冲突并没有使美国战略西移,反而可

^① NATO, “Speech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at the 68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O Parliamentary Assembly (NPA),” November 21, 2022,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09237.htm?selectedLocale=en.

^② White House, “Fact Sheet: The 2022 NATO Summit in Madrid,” June 29,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6/29/fact-sheet-the-2022-nato-summit-in-madrid/>.

^③ “South Korea Admitted to NATO Cyber Defense Center,” *Infosecurity Magazine*, May 5, 2022, <https://www.infosecurity-magazine.com/news/south-korea-admitted-to-nato-cyber/>.

^④ 《北约秘书长出访韩日 韩教授:牵制中国》,新华网,2023年1月30日, http://www.news.cn/mil/2023-01/30/c_1211723089.htm.

^⑤ “NATO Foreign Ministers Wrap up Meetings with Focus on China and Support to Ukraine,” NATO, April 5,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213454.htm?selectedLocale=en.

^⑥ 吴敏文:《“环太平洋-2022”军演演练了什么》,《中国青年报》,2022年7月21日, http://m.cyol.com/gb/articles/2022-07/21/content_LKOb8iG7V.html.

^⑦ 《“漆黑-2022”演习为亚太地区安全蒙上阴影》,光明网,2022年9月1日, https://mil.gmw.cn/2022-09/01/content_35995347.htm.

能促使美国在未来投入更多自身和盟友力量牵制中国,防止中国西顾。

五 美国推动欧洲附庸化的政策评估

短期内,美国对欧洲的附庸定位及其衍生政策可能给美国带来某些安全、经济和舆论收益。但从长期来看,美国弱欧控欧与损欧利美等政策将损害美国霸权基础;欧洲大国不仅不会甘于为美国附庸,反而可能在美国的政策压力下更加积极寻求自立自强之道;俄罗斯、中国不会被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关系所威慑,更不会因此走上结盟对抗的老路;世界经济与全球治理可能因美国对欧政策受到消极影响。

(一)“强美弱欧”损害美国霸权基础

投资美国、削弱欧洲似乎可在此消彼长之间拉大美欧实力差距,为美国控制欧洲创造条件。但是,这些政策的副作用与长期效果却可能使美国得不偿失。

一是因为美国国内社会对立可能因欧洲财富短时间内的迅速涌入而进一步上升。无论美国投资科技前沿领域还是吸引欧洲财富转移,受益方均为美国垄断资本,民众极少能从美国濒临失灵的分配机制中获益。^①除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外,美国资本还将有更强能力在国内事务中进行政治操控、舆论引导,乃至阶层剥削、代际掠夺,这将导致更加严重的社会对立——对美国精英有益之事未必对美国有益。二是因为损欧压欧可能激发欧洲社会原已淡化的反美主义,从根本上破坏美欧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欧洲反美主义思潮在冷战期间一度走向低谷,却从未消失。如果美国现行对欧定位长期延续,将有可能激发欧洲民众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反感和问责,反对“军事控制”“宗教退化”“消费主义”等传统反美情绪可能在欧洲同时复苏。^②三是因为欧洲在美国地缘战略中的不可替代性终将迫使美国改弦更张。美国一味强调和加大欧洲对本国的安全依赖,却忽略了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对欧洲的根本性依赖。如果欧洲在美国的政策盘剥下过于衰弱,且美国没有可以取代欧洲的欧亚大陆“前沿阵地”,则今天美国从欧洲的收益终将因形势所迫反向投入欧洲,届时战略主动权将回到欧洲。

(二)欧洲大国引领提升战略自主

“承认和接受欧洲安全离不开北约和美国,并不意味着欧洲放弃了对战略自主的

^① 张一飞、姜溟予、郑猛:《精神·制度·科技——论西方发展模式的崩坏与重构》,载《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19-20页。

^② 王晓德:《文化的他者:欧洲反美主义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追求。相反,欧洲战略家们从乌克兰危机中进一步认识到欧洲自主的紧迫性。”^①在美国对欧政策下,欧洲大国损失较大,最有可能因战略受制而“触底反弹”,寻求提升自身战略自主性,并领导欧洲团结摆脱被动牺牲地位。其中,法国、德国已经出现利用美国与其他大国博弈提升自身战略地位的倾向。

一是因为经过多年经营,欧洲已经形成追求战略自主的指导理念。自2010年欧洲议会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战略自主”概念以来,《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永久结构性合作”框架性协议、《欧盟—美国全球变化新议程》等纲领性文件、协议所塑造和凝聚的欧洲自主意识始终存在。俄乌冲突爆发后,2022年3月,欧盟27国领导人通过了《凡尔赛宣言》,决意增强欧洲防御能力、推进能源自主和促进经济增长。欧盟还批准了《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行动计划,为欧盟未来五到十年安全和防务工作绘制蓝图。^②二是因为通过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言行,欧洲大国已经普遍认识到其对欧洲团结和各国利益的实际伤害,不得不重新评估继续配合美国战略的得失利弊。2022年1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带领众多德国头部企业访华,中德经济合作打开新局面。^③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随即表示反对欧洲因美国卷入台海问题,并力主加强欧洲战略自主。^④这些举动均属对美国“洗劫”与“绑架”的反抗,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意基础,在未来可能重复上演。三是因为扩大北约功能、行动范围不符合欧盟整体利益。欧盟的主要传统安全关注仍然集中在本地区,参与美国全球战略、为亚太事务消耗自身资源和声誉的意愿有限。与美国联合军事演习、声援西方自由主义国际规则、接受亚太国家加入北约功能性组织已逼近欧洲大国在北约框架下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合作的行动上限。

(三) 俄中两国更加走近但不结盟

一些西方学者依据权力均衡理论“本能”地认为,在美国加紧控制欧洲的情况下,俄罗斯与中国将不得不以结盟的方式实现集体安全,“美欧”与“俄中”将各自结盟并

① 冯仲平:《战略自主关乎欧洲命运》,载《欧洲研究》,2023年第1期,第11页。

② 参见黄颖:《欧盟的“战略自主”困境更加凸显》,载《世界知识》,2022年第10期;杨娜:《战略自主视域下欧盟自我定位的变化》,载《人民论坛》,2023年第3期;李泽晖、李韬:《欧洲防务合作又有新动向》,《解放军报》,2022年2月11日。

③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外交部,2022年11月4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11/120221104_10800441.shtml。

④ 《马克龙:法国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当美国附庸》,中国网,2023年4月13日,http://news.china.com.cn/2023-04/13/content_85227448.htm。

展开集团对抗。^①不可否认,美国与欧洲深度绑定确实在客观上加剧了国际社会阵营化分裂的风险,为防止极端情况发生,俄中两国关系势必更加走近,以求维持全球战略平衡。但是,俄罗斯与中国走向联盟关系不符合两国的经验认知和实际需求。

一是因为中苏关系有过在极短时间内从军事联盟转向分裂对抗的历史教训。二是因为欧洲国家寻求战略自主的努力大大削弱了美欧对俄中的施压能力。美欧之间、欧盟内部对俄制裁均存在分歧,欧洲大国亦频频向中国抛出经济“橄榄枝”,俄中结盟不仅不利于两国“集体安全”,反而有可能封死欧洲战略自主的出路,迫使其不得不全面倒向美国,这不符合俄、中、欧三方利益。三是因为俄中关系始终服务于国内人民美好生活,转向以集体安全为主流的合作模式将不利于两国社会经济发展。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期间亦没有放弃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打造可持续发展经济体系,^②中国更是坚持人民至上,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③两国致力于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不会在两国关系中以安全完全覆盖发展议题。

(四)全球发展或将面临放缓、倒退的困境

美国对欧战略定位及其政策衍生多属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短视行为,不仅不利于西方世界内部团结,更有可能加剧全球治理赤字,恶化世界发展前景。

一是因为如果美国采取各种手段造成欧洲国家与中国严重交恶,可能在事实上造成北美、西欧、亚太三个世界经济中心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两两对抗关系。如此,全球主要贸易、投资市场同步走向恶化,世界经济发展势必遭受严峻挑战。二是因为如果美欧关系因美国对欧战略定位受到冲击,且东西方关系更加恶化,全球合作恐将陷入停滞,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反恐禁毒、金融安全、债务重组等问题都将加剧。三是因为如果国际政治阵营化加剧,西方与非西方大国身份对立恐将更加严重,利益调和也将更加困难。美国刻意强化西方身份共同体,突出东西方文明的“敌我”之分。欧洲可能受此影响,以身份界定利益,国际文化恐将从“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④

^① Bruce Russett and Allan C. Stam, "Courting Disaster: An Expanded NATO vs. Russia and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3, No.3, 1998, pp.361-382; Mathew Kroenig, "Washington Must Prepare for War with both Russia and China: Pivoting to Asia and Forgetting about Europe Isn't an Opinion,"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18,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2/18/us-russia-china-war-nato-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

^②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提出俄经济发展六原则》,新华网,2022年6月18日, http://www.news.cn/2022-06/18/c_1128753393.htm。

^③ 杨明:《正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求是网,2022年1月26日, http://www.qstheory.cn/dukan/hqwg/2022-01/26/c_1128302456.htm#:~:text=。

^④ Alexander Wen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46-250.

六 结语

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欧战略定位集中反映出近年来美国战略思维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原则缺失,自私自利。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欧洲国家对跨大西洋关系特殊性的“幻想”,不断破坏同盟关系的底线与全球发展的大局,驱使欧洲为美国“火中取栗”,实现美国资本增值。以私利至上为原则等于没有原则,这在美国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友的战略定位及其衍生政策中也有体现。二是战略缺失,行为短视。“趋利避害”是战略的关键,但“逢利必趋、逢害必躲”却是战略的大忌。美国试图在对欧关系乃至所有对外关系中占尽全部好处、规避所有风险,这无异于宣布美国没有战略目标,只有“投机”和“去责”两种错误心态。

如果俄乌冲突在未来某一时刻结束,影响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诸多因素又将发生重大变化。一是欧盟将更有能力专注于发展经济和软实力,美欧硬实力差距可能缩小;二是俄罗斯对欧洲的外部压力下降,美国将缺少控制、剥削欧洲的安全抓手;三是欧洲进程性团结将逐渐取代议题性团结,美国将面对一个自主意愿更强的欧洲。在正常情况下,美国对欧战略定位将转向平等伙伴,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美国某些政客不顾现实条件约束,继续谋求将欧洲附庸化的可能。如此,中国的发展壮大将可能成为后俄乌冲突时期美国控制欧洲的主要切入点。中国应对这一前景保持充分警惕,坚持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经营中欧关系,全面提升中欧合作与发展水平,不断降低中欧因国情、文化、制度差异以及欧洲对美路径依赖所形成的交易成本,以维护全球和平发展大局,抵制美国分裂世界、损人利己的逆流。

(作者简介:张一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责任编辑:张海洋)